

## 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

余敏玲

### 摘要

中、西方史家常因歷史後見之明或政治因素的影響，對於蔣介石的評價幾呈兩極。兩岸史家倒是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都認為 1923 年蔣介石遊俄歸來之後，即對未來中俄關係充滿疑慮，甚至積極反對聯俄政策。如果我們對照史料，會發現過去的研究是將這段歷史過度簡化了。筆者認為研究蔣介石對聯俄政策的態度，不應該是一種黑白分明、截然二分的詮釋，而應該承認這中間有個比較模糊的灰色地帶。本文試圖呈現的蔣介石既不是一個反共的先知先覺者，也不是表裡不一的反共陰謀家，而是一個認同蘇聯革命的某些理念，卻又對其實際作為有所保留的國民黨員，北伐初期一貫支持孫逸仙的聯俄政策。如果我們能從一個人的角度，而不是非聖即魔的兩極化角度，來研究蔣介石，來看他在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能看出一個比較複雜、全面的歷史圖像。

關鍵詞：蔣介石、共產國際、聯俄政策、世界革命、國民黨

# A Reassessment of Jiang Jieshi an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Miin-ling Yu

##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hindsight and politics, historians in the West,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ve had polar opinions of Jiang Jieshi: often either completely negative or completely positive. Yet, there is a “consensus” among historians on both sides of Taiwan Strait. They all believe that after Jiang Jieshi's visit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23, 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Many even agree that he actively oppose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Having tested these assertions against available new materials on this subject, we find that past research has over-simplified this part of history, which, in reality, exists a gray area. Jiang Jieshi was not an anti-communist prophet, nor a double-faced anti-communist intriguer. Rather, he was a loyal member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Guomindang) who identified with certain aspects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but who also had some serious reservations about that revolution. In f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he consistently supported Sun Yat-sen's policy of allying with the Soviet Union.

We must study Jiang Jieshi as a human being, not as a saint nor a dem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true place in China's history. This perspective in combination with newly available materials, shoul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iang Jieshi and of the early Sino-Soviet relations.

**Key Words:** Jiang Jieshi, Comintern,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the Soviet Union, World Revolution, the Nationalist Party (GMD)

# 蔣介石與聯俄政策之再思\*

余敏玲\*\*

- 一、前言
- 二、蔣介石訪俄及其遊俄報告書
- 三、蔣介石支持聯俄政策的言論與行動
- 四、中山艦事件與聯俄政策
- 五、結論

## 一、前言

儘管海峽兩岸與西方史家對蔣介石評價不一，無人能否認蔣介石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關鍵性地位。絕大多數西方史家很可能因為「蔣介石丟掉了大陸」的後見之明，或基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心理，對蔣持負面看法。<sup>1</sup>還有一些西方學者則因為意識形態屬於堅定的左派，對蔣亦採否定觀點。伊羅生(Harold Issacs)的觀點在西方學界是最有名也最具影響力的一位。緣

---

\* 本文英文初稿原宣讀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舉辦的國際會議“New Research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gards on the 1920s”（1998年10月5-10日）。中文稿修改期間，承蒙蔣永敬、汪朝光、陳永發、沈松橋、匿名審查人等諸位先生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表達由衷謝意。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sup>1</sup> 艾愷(Guy S. Alitto)，〈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中正先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7年），冊1，頁722-808。Alitto是少數西方學者之中對蔣介石持較正面看法的。

於 1927 年蔣介石的清黨，他稱蔣為「革命的叛徒」。<sup>2</sup>兩相對照，台灣過去數十年的史學著作一向推崇蔣介石為時代的偉人。<sup>3</sup>1987 年戒嚴法解除之後，長期受到壓制的批評觀點開始浮現，除了黃仁宇對蔣介石具有同情的瞭解之外，<sup>4</sup>所有著作均以批評他在道德、政治、軍事方面的失敗為主。其中的代表是李敖與汪榮祖合撰的著作。<sup>5</sup>鐘擺剛好從一極端走向另一極端。正當台灣對蔣的評價已到谷底的時候，大陸史家則是反其道而行。由中共建國後的極力詆毀醜化，<sup>6</sup>到這十多年來開始對蔣有部分肯定；即使他們尚不能完全將意識形態放一邊，也承認蔣投身辛亥革命和參加兩次國共合作發揮的某些積極作用。<sup>7</sup>

兩岸學者雖然對蔣介石的評價因政治環境的改變而各呈兩極，卻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都認為 1923 年蔣介石遊俄歸來之後，即對未來中俄關係充滿疑慮，甚至積極反對聯俄政策。這個「共識」的形成，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接受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的說法。此外，無論是如台灣學者所言，蔣介石因此成為洞察機先的反共先知；還是如大陸學者所言，他是在玩兩面政策；兩者咸認蔣介石聯俄唯一目的是為了取得蘇俄的援助。<sup>8</sup>如果

---

<sup>2</sup> Harold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sup>3</sup> 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 年）；湯承業，《先總統蔣公的父道與師道》（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 年）；呂士朋，〈蔣中正先生的忠貞——氣節與革命薪傳〉，《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1，頁 255-278。

<sup>4</sup>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公司，1994 年）。

<sup>5</sup>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台北：商周出版社，1995 年）。

<sup>6</sup> 醜化蔣介石的最佳代表作是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

<sup>7</sup> 宋平，《蔣介石全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年。乃 1987 年《蔣介石生平》的增修版）；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 年）；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張憲文、方慶秋編，《蔣介石全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該書肯定蔣的地方還有一項：反對台灣，堅持一個中國，頁 13。

<sup>8</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 年），頁 21、24-26；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年），頁 234；王聿均，〈中

我們對照史料，會發現過去兩岸學者將蔣介石與聯俄政策的歷史過度簡化了。蔣介石支持聯俄政策固然與利用俄援有關，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對蘇俄向來沒有好感，也不表示他完全不認同蘇俄的政治理念與軍事制度，尤其不表示他反對以俄為師的主張與孫逸仙的聯俄政策。

事實上，蔣介石遊俄歸來初期也認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可以相容的部分，國民革命可以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另一方面，蘇聯提倡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希望將中國的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納入其中。所以雙方的相容也包括意識形態在內，只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相容，到了中山艦事件之後急劇衰退。中山艦事件之前，蔣介石一度相信由共產國際協助國民黨，那麼中國革命成功的機會更大，也更有意義。因此他積極支持聯俄政策，甚至有「紅色將軍」之稱。<sup>9</sup>中山艦事件之後，他仍然試圖維繫該政策於不墜，但內在與外在環境已經逼使他不得不漸漸改弦易轍。北伐順利固然是蘇聯顧問功不可沒，然而兩造之間的歧異日漸凸顯；共產黨勢力的驟長；加上鮑羅廷一心想置蔣介石於國民黨左派的控制之下，雙方關係加速惡化。蔣介石體認到若不採取斷然措施，將難以掌控國民革命的主導權，因此清共勢所難免，聯俄政策自然也無法繼續下去。筆者認為研究蔣介石對聯俄政策的態度，不應該是一種黑白分明、截然二分的詮釋，而應該承認這中間有個比較模糊的灰色地帶。本文試圖呈現的蔣介石既不是一個反共的先知先覺者，也不是表裡不一的反共陰謀家，而是一個北伐初期一貫支持孫逸仙的聯俄政策，認同蘇聯革命的某些理念，卻又對其實際作為有所保留的國民黨員。

1920 年代的中蘇關係一直是個神秘複雜，又備受爭論的課題。過去對於這個議題大多只能從二手資料著手，來推敲當時國共兩黨與蘇聯的關係。

---

正先生訪俄及其觀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年），冊2，頁77-121；李國祁，〈先總統蔣公早年對蘇聯及共產主義的認識〉，《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15（1987年），頁229-247；宋平，〈蔣介石全傳〉，上冊，頁104；楊樹標，〈蔣介石傳〉，頁37；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頁63；張憲文、方慶秋編，〈蔣介石全傳〉，頁4-5。

<sup>9</sup>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 1980), p.260.

政治環境的鬆綁，新史料的出版，檔案的開放，終於讓我們有機會對於 1923 年蔣介石訪問蘇聯及其後來對聯俄政策的看法，有比較深入的瞭解。政治本來就是複雜的，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怎麼可能是只有一個面向的簡單人物？完全神化或醜化蔣介石，無助於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瞭解。如果我們能從一個人的角度，而不是非聖即魔的兩極化角度，來研究蔣介石，來看他在歷史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能看出一個比較複雜、全面的歷史圖像。

必須一提的是關於研究蔣介石早期的史料問題。蔣介石素有寫日記的習慣。1937 年 3 月出版的《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乃是他委託小學老師毛思誠擇抄日記，再親自審定而成。1992 年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的《蔣介石年譜初稿》，為毛編的原稿秘本，並印出蔣介石親筆刪改的部分。不過，蔣向來有重新修改自己文字（不管是否發表）的習慣。如果對照年譜初稿與北伐前後或海外編輯的蔣介石言論集，會發現他演講中比較激烈或親蘇的文字，不是被節略，就是文字上有所更動。換言之，《蔣介石年譜初稿》雖然已經增補了一些毛編一書中刻意刪除的部分，但還是不夠完整。因此，不論是使用毛編一書，或是《蔣介石年譜初稿》，甚至連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俗稱大溪檔案）中的〈事略〉、〈困勉記〉等，均需審慎使用，宜再與其他地方出版的蔣介石早期言論，作一參照對證。目前筆者能夠找到比較完整的蔣介石言論集有《黃埔叢書》（編者根據蔣介石當場演講記錄而成書）、《蔣介石先生演說集》、《蔣介石先生言論集》、《黃埔訓練集》。這些集本內容或互有不同，但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sup>10</sup>

<sup>10</sup>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1937 年印行，香港龍門書店 1965 年影印出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年），以下簡稱「《年譜》」；賈伯濤編，《黃埔叢書》（出版地不詳，1925 年 10 月）；蔣介石，《蔣介石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1929 年）（另一版本為廣州，1927 年）；暹羅華僑日報印，《蔣介石先生言論集》（出版地不詳，1938 年），其中包括蔣介石的公開信；《黃埔訓練集》（出版地、時間不詳）提及俄國部分較少，但仍有參考價值，另有鄧文儀編，《黃埔訓練集》（南京，1947 年），兩者內容則完全一樣。

## 二、蔣介石訪俄及其遊俄報告書

自 1920 年開始，孫逸仙即斷斷續續與俄國人接觸，尋求各種可能的援助，以完成其革命事業。鑑於歐洲共產黨革命失敗，蘇聯當局也試圖在亞洲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點燃革命之火。當蘇聯排除吳佩孚為可能的合作對象，孫逸仙又放棄從西方取得外援的希望之後，雙方接觸日益頻繁，積極考慮合作。<sup>11</sup>

1920 年，孫逸仙曾在上海會見波達波夫（A. S. Potapov，沙皇時代的軍人，後來轉而支援十月革命）。孫逸仙雖不相信俄國能成功地實現共產主義，但要波達波夫轉達對列寧的問候。波達波夫則說服孫逸仙派兩名代表到俄國。孫原打算讓廖仲愷與朱執信於次年 8 月動身，<sup>12</sup>但這個計畫遷延時日，到 1922 年夏天，孫要正式派人前往時，廖仲愷正忙著與越飛（A. Joffe）洽談與俄國合作之事，無法分身；朱執信（孫的軍事聯絡人）又已遭暗殺。由於孫此回派人赴俄的主要目的在軍事，蔣介石當時是孫身邊僅有的對軍事事務有相當瞭解的人，因此他成了銜負孫赴俄使命的適任人選。1922 年 11 月 21 日，孫逸仙告知蔣介石將前往俄國考察軍政黨務。<sup>13</sup>

由於蔣介石深受曾國藩、王陽明學說的影響，在清黨後的政策也日趨保守，因此許多人認為蔣介石一生的思想也都十分保守，五四時代的各種新思潮似乎都與他沾不上邊。其實不然。他也年輕過，也曾經分享過五四青年那種慷慨激昂的愛國情緒。他和典型的五四青年一樣，不但深深關懷中國的前途，也閱讀當時的激進雜誌，如《新青年》、《新潮》、《東方雜誌》，認真地研究當時的新思潮。有一度他還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蔣介石認為革命之前的俄國是個帝國主義國家，常常欺凌中國。但是十月革命之後，俄國變

<sup>11</sup> 吳佩孚因為強烈反對蘇軍進駐蒙古，使得蘇聯當局決定中止與吳合作。

<sup>12</sup>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學合編，《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莫斯科，1996 年），卷 1，文件 7，頁 46。以下簡稱《聯共檔》。

<sup>13</sup> 孫逸仙，《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冊 5，頁 379；冊 6，頁 616；《年譜》，頁 414。



了。他也像其他的五四青年一樣，感染到對俄國的嚮往，也想到這個新國家去看看。1919年他開始學習俄文，研讀《俄國革命記》。1921年他建議孫逸仙以俄為師，以求自立自強。蔣有雄心大志改造中國，認為到俄國考察是第一步。<sup>14</sup>

蔣介石對俄國的好感，亦可從他強烈地為蘇俄新政府辯護看出來。他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文中即指出，那些認為布爾什維克黨是恐怖組織者，是誤解了蘇聯。他讚揚列寧的政府與組織。辯稱當前的俄國政府並非處於無政府狀態。他和孫逸仙看法相同，認為新經濟政策已經改變了俄國共產主義。由於許多中國人不知道這些變化，所以批評俄國共產主義太過激進。<sup>15</sup>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讚賞的新經濟政策，實則是蘇聯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失敗後採行的新政策，它允許部分私有制與較多自由的經濟活動。

除了嚮往這個新國家之外，蔣介石希望赴俄考察的另一原因，則是他對當時華南的政治感到十分失望。在一封給朋友楊庶堪（字滄白，時任廣州大元帥府秘書長）的信，他寫道對於陳炯明拿下潮州與汕頭感到沮喪，並擔憂將陳趕出東江的困難性。由於這些因素，廣東已經不可能成為國民黨的基地。「倘不再離粵，則昔日之同事，盡為我所侮辱。於公既無補益，於私則個人之情感幾將斷絕。」他自認自己的才能不在成為參謀顧問，而在成為領軍的將官。留在廣州將無所事事。「為今之計，捨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sup>16</sup>1923年8月5日，蔣介石等在上海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G. Maring, 原名 H. Sneevliet)，並與張繼、汪兆銘、林業明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

當天他曾草擬了一份給蘇俄黨政負責人員意見書。這是他在西北軍事計畫書之外，另文陳述中國革命經過之利弊與將來軍事之進行。文中提到中國革命屢起屢敗，主要是因為沒有自己的軍隊。而中國革命長期失敗也會影響到世界革命的前途。雖然他認為革命成功必須仰賴軍事與宣傳同時並進，

<sup>14</sup> 《年譜》，頁 39、48、220、55、57、62。

<sup>15</sup> 蔣介石，《自反錄》，集 1 卷 6（出版地不詳，1931 年），頁 488-489。

<sup>16</sup> 蔣介石，《自反錄》，集 1 卷 4（1923 年 7 月 13 日），頁 259-261。

但是當務之急在於運用有主義、有訓練的軍隊，剷除軍閥與列強的惡勢力。若徒恃宣傳工作，而無實力為奧援，則革命收效當在三十年之後。最後，他寫道「今日所陳中國革命之軍事與宣傳意見書，亦可作蘇俄之軍事與宣傳進行中一部份。」這份意見書稿已隱然將中國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而且認為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是互利的。<sup>17</sup>一言以蔽之，從十月革命到他訪問蘇聯之前，蔣介石對俄國的觀感是完全正面的。

1923年8月16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自上海啓程赴俄，9月2日抵達莫斯科。這個以蔣介石為首，王登雲、沈定一、張太雷為成員的代表團，在俄國停留了將近3個月，11月29日啓程回國。<sup>18</sup>雖然俄國官方文書私下稱該團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但是當時俄方對外宣稱是中國共青團來訪，「根據上級指示，不舉行歡迎儀式，訪問盡量秘密進行。」俄方有意低調接待該團，可能是因為不願引起列強注意之故。蔣介石前往參觀一兵團之前，原欲穿著全套軍裝，在俄方人員勸阻下才換上便裝。正如俄方隨團人員準確地觀察，蔣介石關心的主要是軍事組織、行政管理機構、技術裝備方面。蔣介石要求對士兵講話，結果共有約400名紅軍戰士出席。俄方翻譯蔣的演說時，作了一些修改。據稱是爲了使其符合共產國際或青年共產國際成員比較正式的講話，「因為蔣介石將軍的演講具有某種坦白直率的特點。」蔣自稱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國民黨黨員與軍人。同時也表明來俄目的是學習與聯合蘇聯，爲打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奮鬥。他的情緒高昂而且十分激動。結束講話時，幾乎是用吼的，雙手還發抖。他的演說得到熱烈回應，代表團要離開時，戰士將他們抬起來，直送到汽車前。蔣介石爲指揮人員與士兵彷彿是兄弟而非上司下屬的關係所感動，也對紅軍的紀律與高識字率印象深刻。<sup>19</sup>

孫逸仙博士代表團此行最主要目的是說服蘇聯援助孫逸仙的西北軍事

<sup>17</sup>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蔣中正致蘇俄黨政負責人員意見書〉，號1（民國12年8月5日），頁1-12。

<sup>18</sup> 王登雲是國民黨黨員，曾留學美國，在代表團中擔任翻譯。沈定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5年5月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後來成爲西山會議派之一員。張太雷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sup>19</sup> 《聯共檔》，卷1，文件85，頁262-264；文件92，頁281。

計畫：在中國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目標是粉碎直系，推翻北京政府。<sup>20</sup>蘇聯雖然沒有應允資助這個計畫，但是答應派遣更多顧問到華南，按照蘇聯模式來訓練中國軍隊。蘇聯當局一再告訴代表團，政治準備工作比軍事行動更重要。蔣介石最後似乎接受了這樣的觀念。<sup>21</sup>他回國後也開始重視主義的灌輸與政治教育（軍校設有政治科），加強組織工作與宣傳。蔣介石這些行動沒有共產黨做得徹底，但不能說他沒有學習蘇聯的意圖。

蘇聯之行對蔣介石最重要的影響，是他在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之間找到共同點。1923年10月中旬，代表團遞送給蘇聯當局一份書面報告：〈中國民族運動與國民黨黨內情況〉。其中談到「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對抗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中國軍閥。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已將中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地。除非我們推翻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否則中國無法有真正的獨立。我們的任務是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因此我們的國民革命也帶有國際的性質。……僅靠中國很難達成這個任務，我們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上與蘇聯合作。」資本主義國家蓄意顛覆蘇俄工農政府的存在，因此蘇聯也可以從與中國合作中獲利。<sup>22</sup>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蔣介石在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中找到一個反對帝國主義的公分母。

蔣介石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時，進而闡發他對世界革命的看法，其中充滿了對蘇聯的讚賞。他說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代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共產國際的使命是領導革命運動，特別是領導被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國家的革命運動。所以共產國際更應該特別注意中國革命，並給國民黨坦誠的建議。基於同一理由，蔣介石也支持德國革命。

<sup>20</sup> 關於西北軍事計畫詳細情形，見楊天石，〈蔣介石的赴蘇使命及其軍事計畫〉，《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6年），輯18，頁616-634。

<sup>21</sup> 《聯共檔》，卷1，文件83，頁257。蔣介石似乎對於計畫被拒絕，並沒有吃驚或不高興的反應。因為根據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司翻譯巴拉諾夫斯基(M.I. Baranovskii)觀察，蔣在兩個月前提交軍事計畫時，情緒十分緊張。為此，兩三天前他尚以情緒緊張、過度勞累為理由，一再要求到療養院休息兩個星期。但是蔣走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亮斯基(E.M. Sklianskii)辦公室後，就立即對巴拉諾夫斯基說，不必安排去療養院了，他已經覺得好太多了。文件92，頁282。

<sup>22</sup> 《聯共檔》，卷1，文件87，頁272-273。

他認為「如果德國革命不能成功，那麼俄國西部戰線也不安全。我們應該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涉。我們應該讓俄國同志幫助德國革命成功。中國位於俄國的東部戰線。中國仍在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影響下。如果中國革命失敗，那麼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將會攻擊俄國遠東（即西伯利亞），」那麼俄國也會有危險。<sup>23</sup>或許有人會認為蔣介石當時講這些話，只是善盡為客之道，對俄國主人表示禮貌而已。雖然這個解釋不無可能，但是從他回國之後的言論來看，其實還是與其在俄所言相當一致的。

儘管蔣介石對蘇聯讚賞不已，他對蘇聯的兩個政策則十分不滿。一是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決議，另外一個是外蒙問題。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決議主要是由共產國際亞洲專家之一維經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起草。決議強調無產階級與農民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的角色，更強調工人階級在反帝運動中的重要性。<sup>24</sup>這個決議等於是將中國革命布爾什維克化。蔣介石讀完決議後憤怒的表示，俄國當局不瞭解國民黨，莫斯科恥為世界革命的中心。<sup>25</sup>他生氣的主要原因是反對在中國過早地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蔣介石與俄國當局爭辯道，三民主義應該成為中國革命的政治口號，因為中國人民三十年來都只知道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是邁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宣傳偏向於用「為獨立的中國而戰」、「國民政府」、「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口號。他認為只有到了第二個階段，國民黨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某些原則。蔣堅持當時中國並不適合立即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理由有二：第一，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文盲，因此會妨礙宣傳工作。北京政府又反對共產主義，若是用共產主義的口號作宣傳，只能作非法的宣傳。而且，公開宣傳共產主義可能會招惹帝國主義國家更深的敵意。蔣介石擔心將宣傳焦點放在共產主義，會使人忽視國民黨的主要目標是要將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第二，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屬於小農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政綱應該是團結所有的中國人，運用統一戰線，促成革命的成功。太早宣

<sup>23</sup> 《聯共檔》，卷1，文件96，頁297、299。

<sup>24</sup> 《聯共檔》，卷1，文件93，頁283；文件98，頁308-311。

<sup>25</sup> 《年譜》，頁141。

傳共產主義只會疏離這些人與國民黨的關係。這些人會支持國民黨的反帝政策，卻會反對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用三民主義作口號，則不會引起軍閥的注意，且小資產階級也不會因此反對國民黨。蔣的結論是，只有等中國獨立之後，才能宣傳共產主義。他的結論與蘇聯強調工人階級的革命角色，呈現鮮明對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Grigorii Zinoviev)答稱，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宣傳口號，不是共產黨的口號。雖然這些口號反映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初期階段，其內容應該更具體和明確。國民黨應該更積極地支持勞工運動。<sup>26</sup>蔣介石對共產主義的保留，也反映在他不願加入共黨。他在莫斯科時，曾有人強拉他加入共產黨，他答說要先詢問孫逸仙的意見，因而招致「為個人忠臣」之譏。<sup>27</sup>

外蒙問題是另一個讓蔣介石對蘇聯不滿的議題。他向來關心外蒙問題。早在 1912 年，見俄國引誘外蒙自治，憤慨之餘，提筆著〈征蒙作戰芻議〉，「甚思提一旅之衆，以平蒙為立業之基。」<sup>28</sup>因此，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接見蔣介石時，告訴代表團如果國民黨切實做好政治工作，則可以從中國本部，而不是（外）蒙古，開始軍事行動。<sup>29</sup>蔣介石對於托洛斯基話中暗示外蒙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感到異常憤怒。其後，他告訴代表團成員說，托洛斯基騙了他們。如果外蒙要獨立，應先徵得中國的同意。<sup>30</sup>

此次的訪問，給予蔣介石親身瞭解蘇聯的機會。它證實了蔣先前瞭解的蘇聯軍政制度的優點，給予他世界革命的觀念架構，來銜接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與反對帝國主義的觀點。但是，他對蘇聯關於國民黨的決議及對外蒙的態度感到失望，認為蘇聯當局不完全瞭解國民黨的革命目標。他也堅持中國當時不適合實行共產主義，這一點與孫逸仙的看法相同。

蔣介石於 1923 年 12 月中旬回到上海時，曾經寄了一份留俄報告書給人

<sup>26</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96，頁 297-298, 303。

<sup>27</sup> 《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類：困勉記，卷 1，頁 14。蔣介石給廖仲愷的信（1924 年 3 月 14 日）亦提及此事。見《年譜》，頁 168。

<sup>28</sup> 《年譜》，頁 18。

<sup>29</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97，頁 307。

<sup>30</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102，頁 346-347。

在廣州的孫逸仙。只是這份著名的報告書，至今下落不明。無論是俄國檔案館或是兩岸相關的檔案館皆遍尋不著。唯一曾經刊載該報告部分內容的是《蘇俄在中國》一書。幾乎所有學者都根據該書來說明蔣介石早期的反蘇立場。但是這本書寫成於 1950 年代，正是蔣介石政府由大陸撤退到台灣，厲行反共抗俄政策的時代。因此不禁令人懷疑書中的許多陳述，是否爲了因應當時的特殊政治環境而撰述或修改。職是之故，本人不認爲書中所提到的蔣對俄觀點全部可信。

《蘇俄在中國》遊俄部分的敘述，關於參觀地點和訪問對象皆與目前俄國檔案大致相符。唯獨書中提到「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並且暗示他與托洛斯基見面多次。<sup>31</sup>根據俄國檔案記錄，他只有在離開莫斯科的前兩天（11 月 27 日），才第一次見到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雙方只會談了 45 分鐘。在這之前，托氏並沒有打算與蔣會面。很可能是蔣介石於 11 月 19 日致函托氏並辭行，讓他改變了主意。<sup>32</sup>事實上，在蘇聯與蔣介石會談最多的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亮斯基(E.M. Sklianskii)與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契切林(G. V. Chicherin)。他覺得受到冷落，感到不快。<sup>33</sup>而在臨走之前，終於有機會和蘇聯紅軍之父見面，確實令他雀躍不已。

至於書中涉及價值判斷的敘述，也有若干與事實不符之處。蔣介石在書中談到自己離開中國之前，相信俄國是真心誠意，無私地要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而且會平等地對待中國。但是到蘇聯考察的結果，使他對蘇聯援助中國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他不但「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而且斷定「本黨的聯俄容共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絕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

<sup>31</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 21-22。

<sup>32</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97，頁 306、308；《年譜》，頁 140。按《年譜》上的記載，蔣也只見過托洛斯基一次。

<sup>33</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90，頁 277-278。

因此，他在遊俄報告中向孫逸仙表示憂心未來的中蘇關係。<sup>34</sup>整體而言，《蘇俄在中國》記載他的對俄評價是負面居多。不但如此，其中還摻雜了一些後見之明。例如，訪俄期間，他注意到列寧臥病沈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sup>35</sup>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的政治鬥爭，確實嚴重影響到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問題是史達林要到 1924 年 12 月發表文章〈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才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實現的可能性，並以此理論反對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這已經是蔣介石訪俄一年以後的事。再者，史托鬥爭最激烈的時候是 1926-1927 年，而不是 1923 年。

《蘇俄在中國》部分敘述值得懷疑的另一例是，蔣介石在書中又提及在國民黨一大開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國民黨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為憂。因此，他在大會結束後，力辭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一職，返回浙江老家。<sup>36</sup>對於蔣介石為什麼在 1924 年 2 月辭職，另有一說。劉馥 (Frederic Liu) 認為是蔣介石和蘇聯顧問對於軍校課程內容與管理方式產生重大歧見，他的計畫受到蘇聯顧問的反對，又不能完全行使職權，因此憤而辭職。<sup>37</sup>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他辭職的真正原因，是廣東禁煙督辦楊西岩拒發軍校開辦費，以及對廣東政府的人事問題不滿。他以為若無改造黨的決心，則國家與國民黨均將毫無希望。<sup>38</sup>蔣這樣的想法在 3 月 2 日給孫逸仙的信中說得更清楚。他認為廣東當前最迫切與最危險的問題，「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也。」他對於孫政府的人事任命極度不滿；言其周圍，少有正人。<sup>39</sup>

<sup>34</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 21-25。

<sup>35</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 23。

<sup>36</sup>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 26。

<sup>37</sup> Frederic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 9.

<sup>38</sup> 《年譜》，頁 158-164。

<sup>39</sup> 《年譜》，頁 160-164。

根據已出版的俄國檔案，蔣介石返抵國門的次日（12月16日），瞿秋白對鮑羅廷轉述沈定一關於蔣的俄國感想。瞿說，代表團分成兩派：蔣介石與王登雲偏向國民黨，沈定一與張太雷偏向蘇聯。他們主要分歧在於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批評與外蒙獨立問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裡有人說，中國代表團內部在打仗。」<sup>40</sup>蔣永敬據此認為蔣介石此行是不愉快的，並且採納他在《蘇俄在中國》的陳述，「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紛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進而推斷另有一份由共產黨寫的遊俄報告書。<sup>41</sup>雖然鮑羅廷聽到代表團意見紛歧時，確曾對瞿秋白說：「現在有必要讓沈定一和張太雷給孫另寫個報告。如果沈能正確說明王和蔣介石將軍一派的特質，那就不能只讓他們向孫報告赴蘇使命，一定要有第二個報告。」<sup>42</sup>但是瞿秋白也對鮑羅廷說，蔣在莫斯科接到孫的電報，其中提到國民黨唯一的朋友是蘇聯，蔣的態度變得比較緩和。「沈（定一）說，雖然蔣還不很滿意，但他對蘇聯似乎沒有不好的看法。」鮑羅廷又問瞿，「蔣訪蘇後，有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和對中國工作的看法？」瞿答說，「不知道。」因此，蔣對蘇聯的觀感是否完全負面，因而另有一份遊俄報告，尚有討論的空間。再者，廖仲愷對鮑羅廷轉述蔣的蘇聯印象與沈定一的說法不同。廖仲愷在蔣剛剛由蘇聯返國當天（12月15日），與蔣談話所得的印象是蔣認為蘇俄「非常有善意，滿懷熱情。」他告訴廖仲愷說，蘇聯確實有誠意援助國民黨，「問題在於國民黨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務。」<sup>43</sup>沈定一與廖仲愷所轉述蔣的俄國觀感都有可能。如前所述，蔣對蘇聯確實有不滿之處，但他還是有讚賞蘇聯的地方。而他的不滿情緒也很可能因為孫逸仙堅持聯俄的電報而沖淡許多。

蔣介石 1924 年 3 月 14 日給廖仲愷的信中有一段文字，是目前所能見到

<sup>40</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102，頁 346-347。

<sup>41</sup> 蔣永敬，〈蔣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記〉，《近代中國》，期 136（2000 年），頁 40-44；蔣中正，《蘇俄在中國》，頁 23。

<sup>42</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102，頁 348-349。

<sup>43</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102，頁 347。



批評蘇聯最嚴厲的陳述，常為學者引用，作為蔣介石早期反蘇的力證。蔣在信中提醒廖仲愷對於俄黨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依他的觀察，俄國共產黨沒有誠意。國民黨只應該相信俄國人所說的話百分之三十，但是廖仲愷則太過信任俄國人。蔣繼而談到俄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唯一目的是要扶植中國共產黨。俄共對華政策是要將滿、蒙、回、藏諸部皆成為蘇維埃的一部份，且對中國本部有染指之意。所謂的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事實上都是凱撒的帝國主義。最後，他對於自己的遊俄報告不受重視，則有感嘆與自責。<sup>44</sup>

就篇幅而言，蔣介石批評俄國部分佔全信四分之一，另外四分之三的重點在痛陳國民黨諸多病根。信的一開始，他就解釋自己離粵回滬的原因，「蓋非發於一時，亦非為一人一事而下此決心者也。」而是因為國民黨本身不力圖振作，自陷於絕境，不思自省，反而責怪他人。他認為孫在廣州已超過十五個月，但是民政、財政、軍政依然一片混亂，毫無起色。依他之見，「現在粵局，不患在外敵之強，而患在內部之雜，即此時吾黨不患在對外之難，而患在治內之艱。」追究原因，孫逸仙固然難辭其咎，但所有參與其事者，包括蔣介石與廖仲愷都有責任。

最後他才一提關於俄國共產黨一事。筆者認為這個附筆可能有其針對性。是什麼因素使蔣介石對蘇聯有如此嚴厲的批評？這可能與信中提及的「事實」有關。自1923年秋天以來，蘇聯即與北京政府為沙皇政府遺留下來的條約問題，商談簽訂新約。其中涉及外蒙部分，北京政府主張蘇軍立即撤離；蘇方則欲待正式會議商定撤兵條件後，再行撤軍。<sup>45</sup>談判結果如蘇方所願。《上海民國日報》根據13日的北京電文，在3月14日刊出中蘇協定草案的內容。<sup>46</sup>其時人剛好在上海的蔣介石，讀到這樣的新聞，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蔣對外蒙問題的態度向來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訪俄期間，他

<sup>44</sup> 《年譜》，頁167。他的遊俄報告應該也有提到對蘇方不滿的兩大政策（詳本文頁61-62）。

<sup>45</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類號03-32，函號478，冊1，〈外交部發駐俄李代表密件〉，1924年3月8日。

<sup>46</sup> 《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14日，版2。

也曾向蘇聯當局為外蒙問題表達強烈抗議。但這份草約沒有清楚地說出俄國軍隊何時會從外蒙撤出，按蔣的觀點，這無疑是俄國帝國主義野心的再現。更重要的是，這也說明了蘇聯政府是在玩兩面政策，一方面與廣州國民政府示好，另一方面又與北京政府交涉，謀取蘇聯的利益。

其次，廖仲愷是當時國民黨員之中支持聯俄政策最力者，也是與越飛談判聯俄之事的主要負責人。蔣介石固然支持聯俄，認為蘇聯有值得國民黨學習的地方，但他對共產主義還是有所保留。他不認為在這過程中應該完全失去自己的立場，而向蘇聯一面倒。他覺得廖仲愷親蘇太過，勸廖不可太一廂情願相信蘇聯，蘇聯也有自身利益的考量。若不省察，將來廖亦有可能成為「俄奴」。蔣為了提醒廖，因此有意把話說得重些。廖仲愷則回信道，廣東財政已有改善，希望蔣能回粵擔任校長。至於親蘇問題，不始於他，也不會因為他而更加嚴重。<sup>47</sup>

此外，學者提出蔣介石反對聯俄政策的另一證據，則與國民黨右派理論家戴季陶有關。一些學者認為，在聯俄容共時期(1923-1927)，戴季陶對蔣介石思想的塑造影響至深，理由是他們兩人為至交。<sup>48</sup>陸培湧(Pichon Loh)將蔣介石描述成一個完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更是大有商榷的餘地。他認為孫逸仙影響蔣最多的是政策與計畫，而不是他的思想。直到孫死後，蔣介石才開始研讀孫的作品，而且蔣對孫的思想的瞭解主要來自戴季陶，其次是廖仲愷。<sup>49</sup>但是陸培湧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蔣介石對戴季陶思想的公開態度是那麼模稜兩可。事實上，蔣介石赴蘇之前（1923年5月），已經讀過孫的《平均地權》。再者，蔣介石與季諾維也夫在莫斯科交談時，曾說過民生

---

<sup>47</sup> 《年譜》，頁169。

<sup>48</sup> Harold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89; Pichon P.Y. Loh, "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 *Modern Asian Studies*, 4:3, 1970, p. 211; Herman Mast & William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V:1, 1974, pp. 86, 96.

<sup>49</sup> Pichon P.Y. Loh, "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 *Modern Asian Studies*, pp. 216, 218-221.

主義是邁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即反映出孫的最新觀點。<sup>50</sup>在戴季陶於 1925 年 6 月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之前，蔣介石的許多演講已經反映出孫在國民黨一大所發表的觀點。<sup>51</sup>當孫試圖將民生主義放在較大的框架來談時，蔣也在做同樣的事。

戴季陶是國民黨員中最早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之一，也是參與中共建黨最深的成員之一，但是因為孫逸仙的緣故，最後並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他就反對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後來他成為西山會議派的一員。<sup>52</sup>1925 年 7 月戴季陶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他同意為了達到國家獨立與自由，為了參與世界革命，中國必須與蘇聯緊密結盟，但是中國不可以失去其獨立性，完全依賴蘇俄。中國不應該忘了自己的需要而盲目的追隨俄國。<sup>53</sup>該年 8 月初他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激烈地批評中共。<sup>54</sup>類似立場又見於同年 12 月 13 日，戴季陶宣佈辭去國民黨內擔任的所有職務後，寫了一封長信給蔣介石，表達他初始即反對聯俄容共之政策（他雖曾積極提倡國民黨改組，但以宣傳教育為主），並不滿日來的黨務糾紛，特別是關於共黨積極活動；強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根本無法相容，對未來黨事感到悲觀。<sup>55</sup>蔣介石對老友持續不斷的反共言行感到無奈又痛恨。1926 年 10 月 18 日，他收到戴季陶的電報之後，在日記上寫道，「舊友多變性，見之痛恨，季陶來電，神經錯亂，更為怨痛。念余孤苦伶仃，何以成事？黨員老朽，豈有不敗之理？」<sup>56</sup>

雖然蔣介石與戴季陶是至交，但是當時他們對於黨務卻各有立場。也可能因此蔣在公開場合對戴思想的態度更為模糊。在他於 1925 年 12 月 25

<sup>50</sup> 《聯共檔》，卷 1，文件 96，頁 298。

<sup>51</sup> Marie-Claire Berge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28-329.

<sup>52</sup>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1966 年），下冊，頁 398-400；415-426。

<sup>53</sup> C. Martin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5.

<sup>54</sup> *Ibid.*, p. 166.

<sup>55</sup>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1959 年），冊 3，頁 979-986。

<sup>56</sup> 〈蔣介石日記類鈔（二）〉，《民國檔案》1999，期 1，頁 7。

日寫給海內外國民黨員的公開信看得更清楚。信中他譴責西山會議派的行為，指控他們想將共產黨趕出國民黨是心胸狹窄。孫逸仙雖然說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但他們都同樣是爲了革命。蔣爲了重申對聯俄政策的支持，還指責西山派誣陷汪精衛，說汪並沒有受共黨蠱惑，排除國民黨員言行，而鮑羅廷更無專斷黨務之說。西山會議派的所作所爲違反了孫的政策與黨的紀律，因此阻礙了國民革命。<sup>57</sup>雖然蔣介石不滿西山派另立黨中央，但也沒因此提議開除這些黨國元老的黨籍。

蔣介石的立場在他寫給另一位好友張繼（亦是西山會議派一員）也可看出來。信中他將中國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國民黨黨國元老的傲慢與嫉妒。爲了完成國民革命，統一中國，孫逸仙倡始的聯俄容共政策應該執行到底。蔣寫道：「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識。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仍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與共產黨合作者，斷定國民黨絕非共產黨所能篡竊而代之也。……故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而在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詆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與賣國之問題，只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能使本黨消滅者，其惟本黨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去年之西山會議，今年之上海大會，弟皆表示反對，此則黨紀所在，無可通融也。……惟兄等圖逞私憤於一時，深中帝國主義者分散革命之勢力毒計而不自知，對弟不惟不諒苦心而反疑之，事之痛心孰過於此。」<sup>58</sup>蔣的黨紀觀念也是來自於蘇聯。他爲了貫徹孫的政策，以革命、統一中國爲其最終目的，不惜與好友保持距離。由此可見，蔣介石是

<sup>57</sup> 《年譜》，頁 484-486。關於蔣爲汪、鮑辯誣這一段，《年譜》（頁 486）中也沒有收錄。被省略的全文如下：「鮑羅廷同志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請。總理曾詔中正『鮑羅廷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之事實，此不獨鮑顧問爲然，而非鮑顧問固亦如是。廖案未發生以前，國民政府與政治委員會等，均依定日期開會，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即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其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得謂『聽鮑一人專斷』。」見暹羅華僑日報印，《蔣介石先生言論集》，冊 1，頁 100。

<sup>58</sup> 《年譜》，1926 年 7 月 4 日，頁 624。

個有自己見解的人，並不是一個頭腦簡單，不學無術的軍人。從 1924 年至 1926 年，他閱讀了許多關於各國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等書籍。例如，《俄國革命軍組織及戰略》、《拿破崙戰史》、《日俄戰史》、《普法戰史》、《經濟思想史》、《將帥之拿破崙》、《列寧叢書》、《法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sup>59</sup>我們可以批評他學得不好，但不能說他沒用功過。蔣介石閱讀這些書籍，想必是苦思中國前途與革命的關係。

### 三、蔣介石支援聯俄政策的言論與行動

如果要執行聯俄政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相容性的問題。三民主義為中國同盟會所始創，但其內涵並不明確。1922 年 6 月，陳炯明砲打廣州白雲山，將孫逸仙撰寫數年的三民主義底稿悉數燒毀。1924 年春天，孫開始對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學生演講三民主義。孫在準備講稿的同時，為了因應新的政治情勢，也藉此機會修改過去的論點。三民主義包含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在 1911 年之前，民族主義指的是漢人反對清朝統治。到了 1920 年代，民族主義則包含了反對外國干涉中國。這個元素成為國民黨反帝的民族主義與蘇聯的反帝鬥爭契合點。孫將民權主義分成三個階段實施：軍政、訓政、憲政。在 1920 年代，他認為只有可能實現第一個階段。在同盟會時代，孫所說的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即為了社會最大福祉，徵收土地增值稅。後來，他又將國家社會主義與促進人民福利的經濟現代化計畫加入民生主義。這些觀點反映在他 1921 年出版的《實業計畫》。到 1924 年他又給民生主義一個更新的定義，即將民生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8 月 3 日，他第一次對學生講授民生主義時，由於受到國民黨內部的壓力，而譴責馬克斯主義。孫演講完畢之後，鮑羅廷對孫施壓，請他修正觀點

<sup>59</sup> 《年譜》，頁 281、351、410、457、585、596、601。蔣介石偶而會記下一些讀書心得。例如，他讀《列寧叢書》，讚賞「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新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之破產原因，甚細密也。」又言：「權力與聯合民衆，為革命之必要。」看法國革命史，則言：「俄國革命之方法，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於法國，其經驗實可寶貴。」頁 457、463、596。

以挽救聯俄容共政策。孫爲了使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能夠繼續，便聲稱民生主義等同於共產主義，因此使得民生主義成爲內容最含混、闡釋也可因人而異的主義。<sup>60</sup>這種模稜兩可性也使 1920 年代的蔣介石能在意識形態上有所調整，尋求兩者的最大公分母，作爲聯俄政策意識形態的基礎。

1925 年 4 月 9 日，蔣介石對黃埔軍校第 3 期入伍生講黨員與主義的關係時，談到「三民主義是整個的，在社會學名詞中，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但是三民主義，是包括一切社會主義，範圍是很廣大的，不是偏狹的；……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裡面，有共產主義集產主義。所謂共產集產主義都是三民主義的一部份，都是要爲無產階級奮鬥以求生存的」<sup>61</sup>有人問蔣介石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關係時，他說兩黨有革命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目標，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顯有不同。〔年譜沒有紀錄不同之處爲何。〕<sup>62</sup>蔣相信三民主義包括共產主義，實現三民主義等於是間接實現共產國際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爲用而不相悖者也。」<sup>63</sup>他堅持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三民主義。俄國人來中國應該宣傳三民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因爲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的現狀。<sup>64</sup>

儘管蔣介石沒有公開說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同之處，他顯然清楚他們之間的相異點。他認爲三民主義是反對階級鬥爭與強制性地沒收土地、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可能爲了聯俄政策能順利進行，他盡量在這兩種主義中異中求同。如此一來，可以與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勢力結合起來。事實上，他堅持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是三民主義，將實現共產主義放在遙遠的未來，正呼應了 1923 年 1 月的孫越宣言，孫逸仙也清楚的在宣言中指出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現勢。

此外，蔣介石也在各種場合公開地宣傳世界革命的觀念及其與中國革

<sup>60</sup> Marie-Claire Bergere, *Sun Yat-sen*, pp. 383,167,382,392.

<sup>61</sup> 《蔣介石先生演說集》，冊 2，頁 67；賈伯濤編，《黃埔叢書》，頁 80；《年譜》記載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年譜》，頁 340。

<sup>62</sup> 《年譜》，頁 321。

<sup>63</sup> 《年譜》，頁 485、468。

<sup>64</sup> 《年譜》，頁 414。

命的關係。他給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革命六大計畫的建言中，寫道中國革命的目的，是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但是反對帝國主義含有國際面向。所有帝國主義國家的敵人就是中國的朋友。所有被壓迫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反對帝國主義。因此中國革命應被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sup>65</sup>他試圖統合所有可能的勢力來反對帝國主義。蔣介石對此策略的運用，最早見於1923年1月寫給廖仲愷的信，其中提到「如欲達政治目的，但期與我所定之目的無礙，而有益於政府，則其餘各事不妨容納若干。」<sup>66</sup>以此邏輯推演，只要有助於國民革命，只要有助於反對帝國主義，其他事情都可以遷就。因此可以說聯俄政策是隸屬於國民革命之下。

在一次中俄官員出席的宴會上，蔣介石將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歸功於俄國同志。此次戰役將陳炯明的勢力徹底趕出粵東，使廣東省成為國民黨穩固的基地。按蔣的說法，中國問題很快就會成為世界問題。中國不能自閉門戶，獨自成就革命。如果中國不聯合世界所有的革命黨，不與平等相待之國家共同奮鬥，那麼中國革命終將失敗。他讚揚並強調此次東征的成功，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國際的實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赴來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努力。因為他們幫助中國革命，就是幫助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並且是俄國革命完全的成功。」（這段話，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完全被省略。）<sup>67</sup>蔣又說，「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有面論，而且是有手論。總理的面論，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子才好。』……事實上蘇俄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意受革命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楣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線，指揮統一是現在對帝國主義者作戰最要緊的一個戰鬥原則。」

<sup>65</sup> 《年譜》，頁386。

<sup>66</sup> 《年譜》，頁114。

<sup>67</sup> 《年譜》，頁472。該演講的全文刊登於《政治週報》，期4（1926年1月10日），頁15。

(《年譜》中沒有這段文字)<sup>68</sup>

或許有人會辯稱蔣介石支持蘇聯，純粹只是爲了取得蘇聯的援助，因爲他大部分支持蘇聯的談話都是在公開的演講。其實，他對於世界革命的支持不但出現在公開演講，也出現在日記與家信。例如，1925年12月，他在日記上欣喜地寫道，10月在廣州舉行的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大會，足證中國已經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sup>69</sup>又如，1926年3月16日，他回答兒子（時在蘇聯讀書的蔣經國）2月的來信，說他很高興看到兒子在思想上的進步。「中國革命完全是帶有國際性的。你對於我近來演講或沒有看到。我同你說一句簡單的話。中國革命如能認爲世界革命之一部份，這樣革命才有意義，否則不能說是革命。」「你從前未入國民黨，今既加入了共產黨，你就拿共產主義爲你的事業，你拿革命爲你的生涯。我雖然未加入共產黨，而爲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我自認我一生的事業是在革命。所以我們父子兩人始終是立在革命戰線奮鬥的。我對於你名稱雖爲父子，在革命上說起來是一個同志，我實在是很滿足的。」<sup>70</sup>

然而，蔣介石也曾表達他與蘇聯當局的歧異之處。在莫斯科時，他便曾經直言反對過早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及蘇聯駐軍外蒙。儘管如此，在廣州的蘇聯顧問多半對蔣介石評價很高。1926年2月，當鮑羅廷在北京對布勃諾夫（Andrei S. Bubnov，在中國化名爲Ivanovsky）使團詳細報告廣州情勢時，他特別指出蔣介石可以說是國民黨中最左派的人。<sup>71</sup>其他的俄國顧問則

<sup>68</sup> 《政治週報》，期4，頁14。

<sup>69</sup> 〈蔣介石日記類鈔，黨政（一）〉，《民國檔案》（南京），期4（1998年），頁6。

<sup>70</sup>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舊稱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全宗號530，目錄號4，卷宗號49，頁88-92。可能有人會不解爲何蔣介石的家信會出現在莫斯科的檔案館。根據當時留蘇學生的回憶錄，學生回國時不能帶走片紙隻字，包括課堂筆記。這些材料就一直放在莫斯科檔案館。另外可能引發的一個問題是，蔣介石在信中到底說了多少真心話？很可能蔣介石爲了討好蘇聯當局故意寫出這樣討好的話。但是這也可能是種後見之明。以目前的情況很難做最後結論，這兩種可能倒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

<sup>71</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21，頁101。布勃諾夫是個老布爾什維克黨員。1924年曾任紅軍中央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他率領一個秘密使團來到中國考察評估蘇聯經援中國，以作爲未來政策的參考。所有使團成員都是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認為蔣介石是孫逸仙最忠誠的追隨者與最好的革命份子之一。其中有位顧問根據蔣介石的演講，視他為共產黨，甚至說他是典型的激進知識份子，如同法國的雅各賓黨人。<sup>72</sup>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語言裡，被喻為「雅各賓黨」是種最高的讚賞。這些顧問均與蔣介石至少有數月之久頻繁的接觸。以鮑羅廷為例，時間也超過兩年之久。素以脾氣暴躁、率性直言出名的蔣介石，如果當時真的反對聯俄政策，很難相信他可以將這種情緒隱藏得那麼好，在與蘇聯顧問往來頻繁之際，仍能不露痕跡。比較可能的解釋是他對蘇聯絕大多數的制度組織，即使不是全部，還是非常崇拜。再者，即使在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的一連串措施，使一些蘇聯顧問開始對蔣有疑心，但是他們仍不將蔣介石視為右派或是反革命份子，<sup>73</sup>也沒人認為蔣的作為已危害到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

除了言論上推崇蘇聯軍政制度與宣傳世界革命的觀念外，蔣介石遊俄歸來之後，遇有適當機會，也會將對蘇聯軍事政治制度的讚賞化為行動。例如，他在黃埔軍校籌辦教導團時，在組織及訓練方面即採用蘇聯新制。在訓練學生方面也是採用俄國的組織與紀律。他曾驕傲地宣佈，黃埔軍團是中國第一支設有黨代表制的軍隊。<sup>74</sup>他甚至要求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L. M. Karakhan)提供政工人員時，將名額給共產黨員。<sup>75</sup>為了提高黃埔軍團士氣到像俄國紅軍那樣的程度，他開始注意對三民主義學說的灌輸。他的理想是使黃埔軍團最後變成像俄國紅軍那樣的黨軍。<sup>76</sup>事實證明後來蔣介石所率領的

<sup>72</sup> C. Martin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Doc. 26, p. 608. 文件作者不詳。根據 Wilbur 的看法，很可能是 N.V. Kuibyshev 將軍極其資深的參謀。見 Wilbur, 頁 598。在中山艦事件之前，只有一位顧問（姓名不詳）對於蔣介石的政治立場持保留態度。他寫道，「很難預測蔣介石是否會變成一個普通的督軍（軍閥），停止玩弄左派原則，或者他會更向左靠攏。」Wilbur, Doc.49, p. 698.

<sup>73</sup> C. Martin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Doc. 50, p. 706; Doc. 51, p. 709.

<sup>74</sup> 《年譜》，頁 231、268、274。

<sup>75</sup> 《聯共檔》，卷 2，第一部份，文件 17，頁 68。

<sup>76</sup> 《年譜》，頁 205、340、414。

軍隊（1925年8月成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即稱爲黨軍，是國民革命軍中最有組織與紀律的軍隊。

#### 四、中山艦事件與聯俄政策

中山艦事件是蔣介石對聯俄政策有所懷疑的開始。中山艦事件發生的原因，已顯露出蘇聯制訂統一戰線政策時，對共產黨的要求，本身即存有內部矛盾。如何要求勢力迅速擴展的共產黨，不能在國民黨活動中太過頭角崢嶸，不能爭領導權，卻同時要中共保持其獨立性，又不允許其發展軍事武力？中山艦事件之後，蘇聯當局仍然對中共作同樣的要求，<sup>77</sup>這無異是自取滅亡。雖然蔣介石在事件之後想繼續維持此政策，但是一連串外在環境的變遷，執行這項任務變得異常艱鉅。此時他在強調世界革命之餘，更重視的是國民革命主導權，不落於外人之手與實踐三民主義。到1927年4月12日，他的清黨已是與此政策的完全決裂。

1926年3月19日，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座艦——中山艦，在沒有校長蔣介石的命令下，從廣州駛向黃埔候用，這一舉動使蔣懷疑是汪精衛派船綁架他去俄國。他一度準備離開廣州，後來又決定留下，並採取一連串因應措施。3月20日他在廣州頒佈戒嚴令，軟禁蘇聯顧問，<sup>78</sup>逮捕若干共產黨員，包括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亦爲共產黨員）。此即有名的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〇事件。雖然中山艦事件並不是蔣介石發起的，但他善用機會，以此削弱蘇聯顧問與中共黨員的勢力，以解決長期以來令他憂心的問題，事後並成爲國民黨內最有權力的人。<sup>79</sup>

<sup>77</sup> 《聯共權》，卷2，第一部份，文件42，1926年4月24日，頁188。維經斯基給陳獨秀信中，要求中共首先要使組織，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都越來越獨立和強大。其次，要反對共黨同志試圖在國民黨內發號施令。基本上代表這個政策的延續。

<sup>78</sup> 按蔣介石日記的說法是，戒嚴時「士兵竟將蘇聯客卿寓所守衛，形同監視，且繳其械，良用歉然。」見〈蔣介石日記類鈔，黨政（一）〉，《民國檔案》，期4，頁8。

<sup>79</sup>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尋求歷史的謎底》（下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頁442-464。

從蘇聯顧問事後嚴厲的自我檢討，我們可以找到引發中山艦事件的部分原因。基本上，蘇聯顧問承認他們與中共黨員在國民黨黨、政、軍方面犯了許多嚴重錯誤。<sup>80</sup>當時正好在中國考察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團長布勃諾夫，歸結原因有下列幾項：工會的工人糾察隊奪取了不屬於其職權的警察功能；中央集權化的軍隊管理做得太快，引起上層軍官反彈；監督中國將軍的機構與人員過多，軍事機關的政委權力過大。布勃諾夫說，「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套了五條鎖鍊：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顧問。」假如俄國將領同樣被套上這五條鎖鍊也會受不了。他警告廣州顧問團全體人員，必須記取教訓。顧問不能直接在第一線領導國民革命的工作，否則會嚇跑大資產階級，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加深國民黨內右派與左派的矛盾，激起打倒赤禍的反共浪潮。<sup>81</sup>其次，意識形態的教授也是一個問題。軍隊政治部批准和頒佈的政治課教學大綱，規定幾十個小時的課，包括軍閥制度、帝國主義、馬克斯和列寧的課程，就是隻字未提孫文主義與孫逸仙。<sup>82</sup>蘇聯顧問幾乎全忘了他們是顧問，而不是指揮官。因為這些嚴重的錯誤，促使蘇聯當局決定對蔣介石讓步，召回華南軍事顧問團團長古比雪夫（N.V. Kuibyshev，化名季山嘉 Kisan'ka），政治部與軍事部副團長拉茲貢（I. Ia. Razgon，化名鄂利金 Ol'gin）與羅茄喬夫（V.P. Rogachev）。其目的在贏取時間，恢復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再伺機除掉蔣介石。

汪精衛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中山艦事件的另一肇因。<sup>83</sup>1926年初，蔣介石對汪精衛的疑心與日遽增，他感到似乎有什麼不利他的陰謀正在進行，想將他逐出政治舞臺。蔣介石在莫斯科時，曾告訴當地一位中國留學生趙世炎關於革命自主權的重要性。<sup>84</sup>回國後，有近兩年時間未再提起此議題，直到1925年底到1926年初，情勢使他更感到自主權的重要。蔣介石已開始為

<sup>80</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43，頁190；文件46，頁198。

<sup>81</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30，頁140-146。

<sup>82</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67，頁279。

<sup>83</sup> 《自反錄》，集1，卷3，頁245-254。

<sup>84</sup> 《年譜》，頁141。

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員在黨政軍中過度突出的角色而感到不安。一旦他覺得國民黨不能控制中國革命的方向時，他開始警告國民黨員，特別是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汪精衛過去常在鮑羅廷寓所召開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的最高機構）會議，對於鮑羅廷、季山嘉的任何提議也是言聽計從。蔣相當不滿汪對蘇聯顧問的過度「遷就謙讓」。就在中山艦事件前後，蔣介石一再提醒汪精衛自主權的重要。「一切實權非可落外人之手，雖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定一限度，要當不失自主地位。」<sup>85</sup>「只要主權在我，何事不可遷就。前次中央及政府，事事聽命於人，以致限於被動地位，此非外人決奪之咎，而精衛拱手以讓之也。」<sup>86</sup>

中山艦事件之後，蔣介石的公開演講提到國民革命的次數遠多於世界革命，對於蘇聯也較少提到。這樣的改變顯示意識形態的相容性已經開始衰退。但這並不意味他完全拋棄聯俄政策，只是提到世界革命時，他也會強調自主權的重要性。「就世界革命而言，固應統一指揮，但各國革命，政權仍須自操之。」<sup>87</sup>至於各國應該聽命於指揮中心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威脅到各國的自主性，蔣介石並沒有明言。在討伐吳佩孚的宣言中，他特別提到「而吳賊所資為號召者，決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sup>88</sup>1926年9月16日，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代表大會。邵的報告中引述蔣介石的話：「革命取得勝利的條件，是統一的領導和統一的意志。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革命也和世界革命一樣需要統一。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領導。因此，國民黨應是中國革命的領導。」同時，他也要求共產黨，應當承認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sup>89</sup>同年12月初，晚宴中央各委員，席間，蔣演說北伐經過。「這次北伐，其性質不單是中國國民革命，

<sup>85</sup> 《年譜》，頁 542。

<sup>86</sup> 《年譜》，頁 553。

<sup>87</sup> 《年譜》，註 1，頁 589。

<sup>88</sup> 這段話在毛思誠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全被刪掉了。《年譜》，頁 649。

<sup>89</sup> 《聯共權》，卷 2，第一部份，文件 101，頁 426-427。

完全是世界革命，在東方革命的一個起點。」<sup>90</sup>而他對蘇聯制度也仍有讚賞之處。例如，他收到鄧文儀自俄來書，特別讚許蘇聯軍隊為青年人民之學校的作法。<sup>91</sup>此外，直到 1926 年底，蔣介石仍有遊俄之意，並要在莫斯科的邵力子代為詢問蘇聯當局之意。倘若當時蔣對蘇聯完全無好感，又為何一再想要遊俄呢？<sup>92</sup>

雖然中山艦事件之後，有些蘇聯顧問對於蔣介石的作為頗有疑慮，但雙方關係沒有因此破裂。其中支援蔣介石最力的是鮑羅廷。事件之前，蔣、鮑關係良好。孫逸仙過世後不久，蔣介石甚至稱呼鮑羅廷為他的老師，願跟隨他的領導從事革命。<sup>93</sup>事件剛發生時，蔣還希望原欲返國述職的鮑羅廷趕快回到廣州。蘇聯顧問也認為只有鮑羅廷能挽回蔣對蘇聯顧問所失去的信任，恢復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sup>94</sup>

鮑羅廷認為中山艦事件已經使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他 4 月底回到廣州時，發現蔣介石要北伐的意念十分堅決。雖然他與季山嘉均認為政治工作尚未就緒之前，不宜北伐，可是他不能讓蔣覺得他反對北伐，因為這意味著所有俄國人都站在汪精衛（反對北伐）那一邊。表面上，鮑沒有反對北伐的言論，私底下，他曾數次與蔣的親近助手談到這種北伐在軍事上可取得勝利，但在政治上是沒希望的。因為蔣介石所要的北伐又回到孫逸仙初始時，視北伐為純軍事行動，而不是群眾參與革命運動的產物。在鮑羅廷看來，三二〇事件之後，北伐思想已失去了革命性質。蔣談的是抽象的中國國民，領導的軍隊只是純粹的軍事組織。<sup>95</sup>

1926 年 5 月期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

---

<sup>90</sup> 《年譜》，頁 830-831。

<sup>91</sup> 《年譜》，頁 631。

<sup>92</sup> 《年譜》，頁 804。

<sup>93</sup> C. Martin Wilbur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p. 145；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71。

<sup>94</sup> 《聯共檔》，卷 2，第一部份，文件 31，頁 153-154。

<sup>95</sup> 《聯共檔》，卷 2，第一部份，文件 79，頁 308-310；文件 94，頁 363-366。

黨員不能在國民黨內佔有關鍵性位置，並得交出在國民黨內跨黨的共黨份子的名單。鮑羅廷認為這樣的限制過度嚴苛，蔣明言若不如此，則國民黨會亡黨。爲了繼續實行孫逸仙聯合各階級的政策，必須如此。<sup>96</sup>同一個月中，蔣介石也採取措施與右派劃清界線，例如撤換和逮捕廣州公安局局長吳鐵城，驅逐廣州市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削弱這些右派在廣東的勢力。鮑對蔣這樣的行動相當滿意。<sup>97</sup>

即使如此，鮑羅廷也常受到他的俄國同僚的批評，認爲他對蔣介石讓步太多。例如，維經斯基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對於鮑羅廷將全部賭注下在蔣身上，感到不滿。他們認爲這會使蔣誤以爲不管他對共黨採取何種態度，反正鮑羅廷都會支援他，使得蔣的野心越來越大。<sup>98</sup>鮑羅廷則提醒遠東局那些反對他過度支援蔣的人說，三二〇事件後蔣的整個政策不是對共黨有害，而是對國民黨左派有害。是左派與共黨期望蔣失敗，其次是右派。他和顧孟餘（左派）毫不隱瞞期待汪精衛在蔣北伐失敗後回來。這樣一來，蔣不得不在兩條路中作選擇：(1)如果左派和共黨反對他，則蔣須與他們鬥爭；(2)他直接走向政治上的失敗。如果蘇聯能堅持目前的方針，不同蔣搞壞關係，維持黃埔軍校的統一，那麼一切都會照舊。如果改變方針，則同蔣的鬥爭就無法避免。他認爲進入這場鬥爭的時機未到，當務之急是時時刻刻準備這個機會的到來。<sup>99</sup>

蔣介石當時處境之難，比起鮑羅廷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山艦事件亦是因國民黨內部矛盾而起。黃埔軍校內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共產黨）與孫文主義學會（右派）的衝突愈演愈烈。共產黨勢力在國民黨內發展太快，頗有凌駕於國民黨領導之勢，右派反共之心因而愈急愈熾，終於導致右派假矯蔣介石命令，開軍艦到黃埔欲綁架他到俄國之戲。<sup>100</sup>1926年4月中旬，兩個

<sup>96</sup> 〈蔣介石日記類鈔（二）〉，《民國檔案》1999，期1，頁4-5。

<sup>97</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94，頁365。

<sup>98</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61，頁260。

<sup>99</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83，頁325-331。

<sup>100</sup>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尋求歷史的謎底》（下冊），頁454-458。

學會在名義上自動取消，實則解而不散，糾紛依然不斷。整理黨務案與逮捕吳鐵城、伍朝樞右派等，不但沒有平息左右派的紛爭，反而使兩派的不滿與要求隨之增多。此時蔣介石倒真成了「中派」，不只是成為左右派爭相指責的對象，也是爭相拉攏的對象。這使得蔣的行事常常陷於兩難。因為無論他怎麼做，總有一方嫌他做得不夠，而另一方嫌他做得過火。他便曾經跟鮑羅廷抱怨過這種進退得咎的難處。鮑說，「蔣成了他們的俘虜。」儘管他一再保證他始終是革命者，永不背叛革命等，但實際上他不得不對中派與右派讓步。他每天向鮑羅廷抱怨，說共黨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願為革命獻身等。<sup>101</sup>

北伐軍事的順利，使得左派與共黨迎接汪精衛的動作更加頻繁。這也迫使蔣介石須為自己與國民革命的前途，另謀對策。1926年9月，鮑接到蔣的電報，建議他與一些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成員去漢口。鮑認為蔣的目的是想利用國民政府和黨中央的聲望，在當地幫助他保住政權。蔣可能已經猜到鮑希望汪回來的想法，所以聲稱要大力推展有利汪精衛回來的運動。鮑稱，在此情況下，蔣的作法是對的。在漢口，鮑可幫蔣，因他寧要蔣而不要唐生智等人，在廣東，他則寧要汪不要蔣。<sup>102</sup>雖然誠如福京（N. A. Fokin，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之一）指出，即使汪回來，左派也無法恢復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新形勢已經形成。<sup>103</sup>但是，當時鮑羅廷與共黨、左派，對於汪精衛返國仍寄予厚望，幻想他是唯一打敗蔣介石勢力的不二人選。此時蔣介石顯然對於他們的迎汪活動，備感壓力。1926年12月13日，在鮑羅廷的建議下，以徐謙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在武漢宣布組成臨時聯席會議，取代國民黨最高機關政治委員會的權力。12月30日，蔣介石則宣佈在南昌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才是國民黨的最高機構。鮑拒不撤銷武漢聯席會議，繼續與南昌抗衡，這無異使蔣、鮑關係雪上加霜。1927年元月中旬，蔣介石親臨武漢，想說服鮑羅廷放棄武漢為中央。他不但沒有達到目的，並且在宴會上

<sup>101</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55，頁239-240。

<sup>102</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97，頁412。

<sup>103</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110，頁461。

當眾受到鮑羅廷的嚴詞侮辱。事隔多月，自尊心極強的蔣介石回想起此景，仍憤懣不已。<sup>104</sup>1927年2月下旬，蔣介石與維經斯基在九江談話時，他表明鮑羅廷需為南昌與武漢衝突負絕大部分責任。他承認過去鮑羅廷對於鞏固國民黨功不可沒，但是鮑當前的作法是分裂國民革命運動。蔣要求蘇聯當局召回鮑羅廷，作為以武漢為國民政府所在地的交換條件。<sup>105</sup>至此蔣、鮑關係可謂完全破裂。

其實，即使蔣與鮑關係不破裂，外在情勢的發展也不容聯俄政策的繼續了。自中山艦事件之後，國民黨雖採取一系列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措施，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卻成績斐然，參加共產黨的人數反而有增無減。廣州就有2,000多名共產黨員，其中從國民黨轉到共產黨的大學生達300人。<sup>106</sup>正如王奇生的研究指出，聯俄容共政策最初是共黨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到中後期卻成了雙向互動，不少國民黨員亦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到了後期，甚至出現逆轉，「中共中央訓令新黨員不必一律加入國民黨，與此同時，由國民黨轉入共產黨者卻有增無減。」難怪在1926年底，已有國民黨人感到，不是國民黨在「容共」，而是共產黨在「容國」了。<sup>107</sup>再者，歷時一年半的省港大罷工於1926年10月結束，其中所展現的龐大工會力量，與上海的三次暴動，在在顯示共黨強大勢力，足以威脅蔣個人權力與國民黨的生存。如何在蘇聯之外尋找支援，已是1926年下半年以來，蔣積極從事的工作之一。1927年4月18日，蔣在建都南京的演講中，雖然聲稱與蘇聯合作的政策不變，清共只是國民黨內部事務，與蘇聯無關，但他一再強調革命主權，操之在我。如果蘇聯顧問要奪此主權，則與蘇聯合作是不可能。<sup>108</sup>在5月4日的演講中，蔣介石已經公開稱呼蘇聯為帝國主義國家了。<sup>109</sup>

<sup>104</sup> 《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類：事略，1927年4月20日。

<sup>105</sup> 《聯共檔》，卷2，第二部分，文件173，頁631。

<sup>106</sup> 《聯共檔》，卷2，第一部份，文件95，頁404-405。

<sup>107</sup> 王奇生，〈論國民黨改組後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近代史研究》2000年，期2，頁73、76。

<sup>108</sup> 蔣介石，《蔣介石先生演說集》（廣州，1927年），頁679。

<sup>109</sup> 同上書，頁697。



## 結論

總結學者認為蔣介石反對聯俄政策的主要來源有三：(1)《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提及的遊俄報告書，兩岸許多學者均毫無保留地接受書中的陳述。(2)因為戴季陶是有名的右派理論家，蔣介石與他的交情至深，又被認為是一個有行動無思想的人，因此戴的右派觀點影響到蔣介石的觀點。(3)伊羅生與一些西方學者的假設：以蔣介石 1927 年的清共為「背叛革命」的基點，以此往前推論，所以蔣介石從一開始就反對聯俄容共政策。

然而，對照各種史料，我們可以看出上述三種理由都站不住腳。蔣介石赴俄前是完全肯定俄國新政府的一切，後來漸漸對其有所批評，而到 1927 年清共的完全決裂。其中有轉折與變化，並不是如他自己在《蘇俄在中國》一書所言，在遊俄期間即已全面反對蘇聯。雖然他在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決議與蘇聯對外蒙政策方面十分不滿，但其中仍有三、四年的時間，他認為中國革命可以納入以蘇聯為首的世界革命，因為國民黨與蘇聯有個共同目標，那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對孫逸仙而言，與蘇聯結盟為他遠在華南的小小軍事力量提供極大的希望。蘇聯的軍事與政治制度，可以強化軍隊與國民黨。蘇聯的反對帝國主義立場與世界革命的關係，可以擴大中國革命的範圍，加入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鬥爭的陣容。除了蘇聯的物質援助之外，意識形態的相容性，也是蔣介石支持聯俄政策的原因之一。簡言之，孫逸仙和蔣介石試圖尋求各種可能的方式來完成中國的國民革命。從這個角度來看，蔣介石不失為孫逸仙的忠實信徒。

由有革命經驗的蘇聯來協助中國革命，前景似乎無限看好。然而，蔣介石眼中的中國國民革命與孫逸仙相同，卻與蘇聯顧問的革命不盡相同。當孫與蔣都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異中求同時，他們兩人並沒有縝密地思考中國革命也應該包括社會革命，對於蘇聯以階級鬥爭改變社會階級基礎的革命基調，不表贊同。當第一次統一戰線形成時，孫、蔣二人均相當有信心。他們相信容共不至於使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強大到要取代國民黨。<sup>110</sup>但是接二連

---

<sup>110</sup> 《年譜》，頁 624。

三的事件打破了這種樂觀的想法。若非孫逸仙早死的話，他也會碰到蔣介石後來所面臨的兩難局面。<sup>111</sup>一旦中國共產黨勢力擴充到直接威脅國民黨時，長久以來試圖避免的難題終要面臨抉擇。這裡不能簡單地用蔣介石的權力慾重來解釋他的抉擇。試問世界上有幾個政治人物沒有權力慾望的？我們在不否認蔣也有權力慾的同時，也必須承認他也有強烈的政治使命感（這樣的使命感是好是壞，則屬於另一個議題），想統一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富強，重新平等地躋身國際社會。他曾數次詢問蘇聯顧問「在我們的時代能有中國的拿破崙嗎？」<sup>112</sup>由此可見，他想成爲一個結束亂局的軍事偉人，我們可以說他的政治改革視野不夠寬廣，但不能說他只是一個有權力慾的獨裁者。

中山艦事件之後的許多外在因素，逐漸削弱蔣介石對聯俄政策的支援；國民黨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的相互利用急遽減少，政治利用則相對地遞增。北伐開始之後，儘管蔣介石與鮑羅廷對於黨務的歧見日深，蔣介石仍需要蘇聯的援助，蘇聯也沒有更適合的人選來取代蔣介石進行革命，雙方的合作關係尚能維持，然而裂痕隨著省港大罷工、國民政府所在地選擇之爭、蔣鮑關係的破裂、上海的三次暴動而逐漸擴大，迫使蔣介石另謀財政支援，與蘇聯做公開的決裂。我們不能說在這段聯俄政策期間，蘇聯與蔣介石沒有互相利用的地方，但是也不應該忽略其他層面。

伊羅生對蔣介石背叛革命的指控是將這段歷史太過簡化了。他醜化蔣介石爲一隻守在地獄之門有三個頭的怪獸(Cerberus)。這三個頭分別面向左、右、中三個方向，而其唯一的野心是踩在他過去的共產黨夥伴的死屍上，以犧牲和蘇聯的合作爲代價，來完成他個人的獨裁。<sup>113</sup>但是誠如本文所示，甚至連蔣介石在莫斯科，在他支援革命最激昂的時候，他也沒說他的革命將

---

<sup>111</sup> 蔣介石在 1926 年 5 月 22 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第二次全體大會上致詞：「此次整理黨務案，在局外人看來，有許多與先總理在日主張不同的地方，不過時代的事實逼到我們的頭上，使我們不能不提出此案。我以爲總理如果尚在，到了今日，亦只有這個辦法。」《年譜》，頁 590。

<sup>112</sup> 《聯共檔》，卷 2，第一部份，文件 46，頁 198。

<sup>113</sup> Harold Iss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89-93.

會是一場社會革命，他有自己的革命定義。他原本認為共產黨終將融入國民黨，當事實的發展很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令他無法掌控革命的方向時，他只好清共，而清共勢必終止與蘇聯的合作。事實上，這個決定反映了蔣一貫的革命目標。諷刺的是，他的國民革命正是當初蘇聯在中國採取統一戰線的目的：中國現階段革命應該實行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的民族革命，並且領導這場革命的是國民黨。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資料彙編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類號 03-32，函號 478，冊 1。
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 年。
3. 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香港：龍門書店，1937 年印行，1965 年影印出版。
4.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舊稱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全宗號 530，目錄號 4，卷宗號 49。
5. 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俄羅斯遠東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學合編，*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莫斯科，1994 & 1996 年，卷 1-2。
6. 孫逸仙，《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7.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類：事略、困勉記，卷 1；籌筆，號 1。
8. 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 年。
9. 賈伯濤編，《黃埔叢書》，出版地不詳，1925 年 10 月。
10.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類鈔，（一）〉，〈蔣介石日記類鈔，（二）〉《民國檔案》，期 4（1998 年），期 1（1999 年）。

11. 蔣介石，《自反錄》，出版地不詳，1931年。
12. 蔣介石，《蔣介石先生演說集》，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
13. 蔣介石，《蔣介石先生演說集》，廣州，1927年。
14. 鄧文儀編，《黃埔訓練集》，南京，1947年。
15. 暹羅華僑日報印，《蔣介石先生言論集》，出版地不詳，1938年。

## 二、報紙、期刊

1. 《上海民國日報》，上海，1924年。
2. 《政治週報》，廣州，1926年。

## 三、專書

1.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2. 宋平，《蔣介石全傳》，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1996年增修版〕。
3.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台北：商周出版社，1995年。
4.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5. 張憲文、方慶秋編，《蔣介石全傳》，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陳伯達，《人民公敵蔣介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7. 湯承業，《先總統蔣公的父道與師道》，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0年。
8.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9. 楊樹標，《蔣介石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89年。
10. 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7年。
11. 黎東方，《蔣公介石序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76年。
12. 嚴如平、鄭則民，《蔣介石傳稿》，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13. Bergere, Marie-Claire, *Sun Yat-s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Iss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5. Liu, Frederic F.,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16. Schiffrin, Harold Z.,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 1980.
17. Wilbur, Martin C. &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四、論文

1. 王聿均，〈中正先生訪俄及其觀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2，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 年。
2. 王奇生，〈論國民黨改組後的社會構成與基層組織〉，《近代史研究》，期 2，2000 年。
3. 艾愷(Guy S. Alitto)，〈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中正先生〉，《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1，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7 年。
4. 呂士朋，〈蔣中正先生的忠貞——氣節與革命薪傳〉，《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冊 1，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7 年。
5. 李國祁，〈先總統蔣公早年對蘇聯及共產主義的認識〉，《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5，1987 年。
6. 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尋求歷史的謎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7. 楊天石，〈蔣介石的赴蘇使命及其軍事計畫〉，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輯 18，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6 年。
8. 蔣永敬，〈蔣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記〉，《近代中國》，期 136，2000

年。

9. Loh, Pichon P.Y., "The Ideological Persuasion of Chiang Kai-shek," *Modern Asian Studies*, 4:3, 1970.
10. Mast, Herman & William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1, 1974.